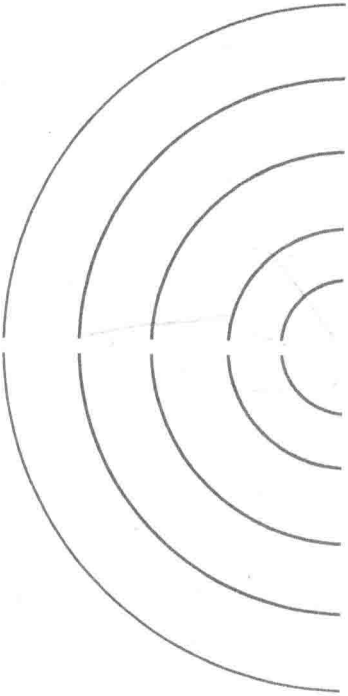




ANNUAL OBSERVATION OF
THE TAIWAN STRAIT IN 2014

2014
台海观察

朱松岭 主编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2014 台海观察

朱松岭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4台海观察 / 朱松岭主编.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08-3719-7

I. ①2… II. ①朱… III. ①台湾问题—研究 IV. ①D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6829号

2014台海观察

作 者 朱松岭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719-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2014：从“太阳花”到“九合一”的观察	1
一、民主：致密共同体建构的原动力	1
二、“太阳花”：共同体自我保护与排异	3
三、“九合一”：共同体自我更新与确立	7
结语	9
2014年台湾政党政治观察	10
一、国民党的变化	10
二、民进党的变化	15
三、台湾政党间关系及影响	21
（一）台湾岛内政党间关系	21
（二）“中间选民”与政党政治	23
（三）台湾政党之间的学习与趋同	25
四、延伸视角：两岸政党互动	27
五、台湾政党政治研究的一般性视角	30
（一）政党政治的基础：内部结构	30
（二）政党政治的基本内容：政党博弈	34
（三）社会视角下的政党政治	37
（四）政治系统与政党政治	40

2014 美台关系观察	42
一、美台政治关系	42
(一) 双方积极评价美台关系现状	42
(二) 美国内阁高官访台	44
(三) 美台政治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45
二、美台经济关系	47
(一) 美台开展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	47
(二) 美台就台湾参加 TPP 展开互动	49
(三) 美国对台湾经济“依赖性”的警告	56
(四) 结语	62
三、美对台军售现状	63
(一) 美台缩小军售问题上的认知差距	63
(二) 美国府院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态度差异	67
(三) 美台在潜艇议题上的互动	70
(四) 结语	73
四、未来展望	74
2014 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观察	77
一、“太阳花学生运动”机制分析	78
(一) 运动中心的领导者与参与者	79
(二) 运动诉求的一致性与对抗性	81
(三) 动员方式的网络化与自主化	82
二、“太阳花学生运动”特点分析	86
(一) 行为的激进性与保守性	86
(二) 过程的互动性与教育性	87
(三) 影响的草根性与广泛性	88
三、“太阳花学生运动”背景分析	89
(一) 美国出手操纵	89
(二) 岛内酝酿已久	90
四、“太阳花学生运动”影响分析	91

(一) 青年世代崛起	91
(二) 台湾政局变化	91
(三) 两岸关系受挫	92

2014 台湾社会历史记忆观察

(一) 台湾社会现象背后的历史记忆及其嬗变	93
(二) 台湾社会历史记忆的嬗变	96
(三) 台湾社会历史记忆嬗变的影响——以 2014 台湾社会为例	100

2014 台湾“九合一”选举观察

一、“九合一”选举概述	104
(一) 基本情况	105
(二) 两党提名情况	114
(三) 选举结果	118
二、“九合一”选举观察视角	122
(一) 台湾主流民意主导了选举结果	122
(二) 科学选战与“中间力量”相结合	124
(三) 中南部地区派系作用式微于政党	125
(四) “在野大联盟”催票效果显著	144
(五) 选制变化易于民进党乱中取胜	145
三、“九合一”选举后续影响	146
(一) 国民党	146
(二) 民进党	152
(三) 两岸关系	154

2014 两岸法律互动观察

一、处理两岸关系的法治思维得到强化	157
(一)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157
(二)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158
(三) “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法律保障	160

(四) 以法治方式反对“台独”，巩固“一个中国”共识	162
二、两岸通过单方立法和共同协议落实两岸人民权益的法治保障	165
(一) 两岸人民权益的平等保障的立法争议	166
(二) ECFA 后续协议协商、签署与生效波折不断	173
(三) 两会互设办事处及其职责定位之争	179
(四) 两岸人民权益的司法保障	181

2014：从“太阳花”到“九合一”的观察^{*①}

朱松岭^①

从“太阳花”社会政治运动到“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台湾民心和政治版图有了明显变化。结果，是选举的最终归宿，是选前一系列问题在选举中的浓缩和选后政治组合的开始。“九合一”的结果与“太阳花”的发酵密切相关，他们作为台湾共同体建构的延续，必将对台湾政局乃至两岸关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民主：致密共同体建构的原动力

1992年，李登辉首次提出“台湾命运共同体”的概念。^②这一含混不清的概念的使用范围涉及从“社区发展”的一般用语到“独立建国”的国民意识的各个层次。恰如勒庞所讲，词语的威力与他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他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他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他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他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他们集于一身。^③“共同体”在台湾形塑主体性的过程中就起到这样的作用。

联合国2758号决议使台湾当局跃马中原、光复大陆的理论体系失去号召力。李登辉上台后的本土化与民主化相结合的政策使得“一个中国”的理论共同体渐趋

* 本文发表于《台海研究》2015年第1期。

① 朱松岭，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

② 林劲：《评李登辉的“台湾命运共同体”》，《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3/4期，第103页。

③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瓦解。正是因为共同体瓦解了，身份认同 (identity) 才被创造出来。^① 身份认同催生新理论，而这个新理论的基础就是将民主与本土相结合。“李登辉的‘台湾生命共同体’一语源于彭明敏的‘台湾命运共同体’概念，乃是‘台湾国民意识论’的基础，是为台湾独立建国的‘民族意识’，是在实现彭明敏于1983年所提出的‘台湾人国民主义’，即在透过公民直选使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彭明敏曾首先提出‘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强调在台湾二千万人为同一命运，与大陆上的中国人为不同命运。这种台独思想浓厚的说法后来被民进党所采用，作为台湾独立理论基础。”李登辉“身为国民党主席，竟有意把这个名词列入国民党党章，真是荒谬不经”。^② 彭明敏在理论层面、李登辉在实践层面将民主与本土联系起来，1991年第一次“修宪”建构“一国两区”，并在“自由地区”实行直接选举，就已经使得台湾作为一个新的共同体的建构走向不归路。

台湾塑造的共同体有致密共同体的特征。致密共同体 (Dense body) 作为有着自生长性和具有强烈排异性的共同体。台湾这个致密共同体以为“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两岸有着质的差异，各自生长、互不渗透，他们作为两个独立、互不相让的致密共同体博弈前行。大陆任何注入台湾的因素都会被内化为致密共同体进一步生长的养分并促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台湾作为一个排异性的致密共同体，具有信仰的特性。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梦想共同体与实际存在的“独也独不了、统也统不得”的实际共同体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分歧。台湾这样一个妄称的共同体，因其将共同体的内化和进一步凝聚融入民主之中、建立在选举之上，它试图在具体化的选举中进一步鼓动、妄称梦想的实现，并以这一共同体假定要提供的正义的名义，要求无条件的忠诚，把缺乏这种忠诚的所有事物看做不可饶恕的背叛和体现。^③

作为“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的台澎金马一旦进行票选领导人和民意代表，它就从一个中国的共同体建构自我矮化为中国的“地方民主割据政府”。由于从彭明敏到李登辉等理论和实务界人士均知晓“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

① [英] 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② 林劲：《评李登辉的“台湾生命共同体”》，《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3/4期，第103页。

③ 《序曲，或是欢迎捉摸不透的共同体》，[英] 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的建构，^①因此他们特别注意建构台湾的共同历史记忆，以之作为民主选举的动员基础和台湾共同体的意识基础，民进党于1993年的“台湾主权宣达书”中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建构。^②投票直选，确实在逐步让“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台湾作为一个共同体从想象走向现实。共同体建构一旦被民众接受并成为常识，其自我繁衍、自我发展、自我维系就如生命的本能与动力般自动运行。生命在意识自我、发展自我，它将“台独”的共同体寓于选票中，每一次选举都是共同体建构的动员和深化。这种如生命本能般的动能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养，使得民主化与本土建构融合进行。

1949年后因“中央政权”的移入及全国精英的迁徙，从而使得台湾从光复不久的殖民地迅速转变为全国精英荟萃并承载“统一”法统的“复兴基地”。冠盖云集，甚至被披上国家正统政权所在地的面纱，在很长时间内占据联合国席位并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使得“统一”成为责任、“光复”成为梦想，每个台湾人均承担着中华民族统一、复兴的梦想。李登辉“宪改”后，“中华民国政权”经过台湾地区选举而成为地方民主割据政权。哲人已萎，硝烟散尽，台湾岛又恢复了它曾经的真实面目：一个移民组成的地方社会。这个社会因各时期的移民凝聚在一起，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以“中华民国”为政权符号并与世界进行联结。

通过选举，台湾作为一个致密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上升为体验，积累为经验，升华为先验，逐步推进、深化致密共同体的建构。

尽管通过民主的方式，尤其是公民投票的方式，可以建构成独立的共同体，也可以把自己建构成更大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很明显，台湾在逐渐成为前者，而无意成为后者。这也就导致了作为致密共同体的台湾在价值观塑造和制度形塑方面离大陆越来越远。

二、“太阳花”：共同体自我保护与排异

共同体的建构和维系中确立成员的身份并在内化中将共同体身份均质化。它既有内部的生长，并将已经内化的因素吸收为自己的养分，固化、遗传、繁衍、传播。同时，共同体又在应对生存环境过程中实现应急、突变和变异。在“中华民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②引自朱松岭：《国家统一—宪法学问题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98页。

国”台湾化的过程中，本土作为既有基因，对具有“一个中国”身份、格局的政党、政治人物具有自我保护本能的排斥，直至这些政党和政治人物蜕化为本土势力或者向本土效忠。因而，台湾政治势力正当性和导向的塑造依然寓于其中。本土势力遍尝权力的滋味走向体制内堕落时，同样成为共同体的排异对象。当体制内无法解决自我保护及排异的功能时，自然外溢为社会运动或社会政治运动。

共同体的自我保护首先来自环境的改变和自身判断的隐忧和现实危险。作为民主割据的致密共同体，台湾一直存在着想象与现实的矛盾、法理与政治的差距、两岸势力消长的冲突。坚持统一的大陆的日益强大、“妾身不明”的台湾相对弱化导致了台湾强烈的敏感性和自我保护意识和排异性。

排异，因稳定的打破而激发，因相对剥夺感的加剧而出现，因大陆成为打破台湾生活方式的假想敌而生怨。台湾这个小型致密共同体，从冷战到后冷战，一直处于适度的稳定状态，但两岸的交流互动打破了这种稳定，极速的和平发展猛烈冲击了稳定并带来了不安全感。1979年元旦大陆《告台湾同胞书》发表，1987年，蒋经国被迫开放老兵探亲，两岸破冰互动；2002年元旦，台湾以“台澎金马特别关税区”的名义加入WTO，进入全球化整合之中；2004年，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一甲子之后再次聚焦镁光灯下并发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使两岸形成“反独”联盟；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两岸积累六十余年的动能通过协议方式爆炸性释放出来，大陆因素前所未有的楔入台湾内部固有的经济结构、社会生活，2012年两岸因素尤其是“九二共识”甚至成为“大选”的关键因素。这种现象在“本土势力”、绿色媒体的操弄、扭曲、抹黑下，使得“三中”、一青为代表的部分弱势群体将大陆作为冲击、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罪魁。捍卫既有生活方式的冲动引发了共同体内部强烈的排异反应。“太阳花”运动就是在此种情势下爆发的。

排异，通过议题表达。议题同合法性紧密相连。排异，就是唤起民众、重构历史事件、固化相关事件的态度倾向、不停刻写、塑造、传播并形成社会认同的话语，形成社会日渐接受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社会记忆、政治记忆。比如，“反中”、“台独”、悲情、反贪腐、反核能、绿色环保、守卫家园、转型正义等都可以成为社会运动的议题，并将之与各种层次的认同相结合，形成新的认同群体。共同体的排异，使它形成了垄断合法的强制性，造就了夺取阵地、同化异端、巩固阵营的客观结果。

“太阳花”运动，蕴含世代更替，贯穿共同体的自我保护。作为社会政治运动，

它徒具学生运动的形式和无政府的表征，实则由脆弱、敏感甚至在政治上别有他图的政客等体制内的领导内核作为发动机，引发排异与自我保护。

台湾，作为建构的致密共同体，其自我更新通过选举和任命完成。但由威权转型的政治体因争权夺利而矛盾重重：“一中框架”下的地区治权，“五权分立”“宪法”规定与“三权分立”现实运作矛盾的病态化、常态化。运行中的立法权与行政权斗争导致行政权受到立法权的绑架，制度性矛盾的存在使得体制内自我更新步履维艰。台湾已经形成了“总统府”政治中心、“立法院”政治中心、政党政治中心以及其他独立性政治中心。而且，台湾当局对共同体内新行动者有不言而喻的开放性。现有的台湾岛内政治结盟关系的不稳定性特点极为鲜明，国民党内有王马之争，地方派系的复杂斗争与整合；民进党在各种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派系斗争一如既往，甚至日渐固化；政党内部，甚至政党之间的利益集团相互寻求奥援以击败党内对手、党外对手以维护其集团利益的方式日渐增多，政学商利益集团走马灯似地寻求着维持利益的同盟者。马英九当局欠缺治理技巧、两岸经贸的日益紧密导致共同体排异情绪爆发。“白色力量”走上街头，通过冲撞合法体制的方式实现排异。贫富分化的全球化及两岸红利的二次分配不到位导致的相对被剥夺感^①酝酿了岛内新一轮社会运动的社会基础，当相对被剥夺感达到社会运动的临界点，并通过自媒体发散出去时，就形成了快闪（flash）式的聚集，并用凝聚各种反对力量和随行力量的方式形成社会运动事件。白色力量走上政治舞台，引导了舆论。对政党的不信任，逼迫政党内部自我更替、政治机器自我更新。起源上的本土势力使得民进党每一次自我更新都是朝向共同体的本能进化，而起源于大陆的国民党则在每一次被动更新中日渐蜕化并逐步走向本土化。

“太阳花”运动打着对政党不信任的旗帜，以社会运动方式进一步凝聚本土势力，进行共同体的排异。通过对自媒体时代台湾社会运动参加者的分析不难看到，这些参加者包括幕后指使者、领导者、坚定支持者、一般支持者、搭便车者等几类。台湾大学生群体的普遍问题是对未来担忧，而且对未来的担忧感已经超过了面对未来的渴望。社会阶层的相对固化、房价的高涨等等已经超过了青年学生对未来预期的极限，面对这样的社会，他们放弃竞争、放弃打拼，置身于网络 and 游戏中消

^① 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是特德罗伯特戈（Ted Robert Gurr）在其《为什么人们造反》（why Men Rebel）中提出来的概念，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强调在人们希望那个他们的政府可以提供的东西——即他们期待有的东西——与他们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之间存在的落差。这种欲望和实际预期之间的鸿沟被戈称为“相对剥夺”，也简写成RD。戈相信，相对剥夺的程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参与到抗议活动中去。

磨时光。但是，这不意味着这批年轻人就失去了抗争意识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越是年轻的大学生群体，越容易被塑造：被政治鼓动、被议题感动、被媒体煽动。

整个人类自进入人民主权时代以来，法源论述、权力论述和权力来源由从上到下变更为从下到上，世代权力中心下移、知识下移、财富下移，老一代和政府的威权已经不是传承的唯一来源，甚至，年轻世代已经对传统及权威失去了敬畏感。他们完全可以依靠网络汲取知识、获得财富，通过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通过年轻人的自由无极限，获取短期刺激、多元理念。他们反对墨守成规、注重“宅”并通过网络尤其是自媒体建立与社会的联系，他们强调与传统不同的身份差异，并通过议题、抗争等逐渐深化、强化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强化的螺旋式上升导致年轻时代很容易被塑造成“自我中心、自我演示”的群体，并在这种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身份的塑造，导致一群人的共鸣。这群人将网络上的身份塑造内化于心，并自发投身其中，将网络互动转化为现实运动，迅速聚焦，迅速分散，形成现实中的社会运动。

“太阳花”运动成功激发了以“小确幸”为核心价值观的台湾青年的政治热情，这批从出生就认为自己所在的国家为“‘中华民国’即台湾”的人，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以“小确幸”为基本内容的“生活台独”价值观。这对瓦解“中华民国法统”及改变政党国家认同的影响实在不容小觑。

“太阳花”社会政治运动爆发时，主要参加者已经成为李扁“台独”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从小到大生活在承平日久的“中华民国”中，没有感觉到硝烟的味道，厌倦了现实中的统“独”矛盾、族群对立和政党恶斗。在他们眼里，台湾一直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统“独”、蓝绿都是伪命题和政党捞取权力的工具。经过“太阳花”运动的发动、引导和重新整合，台湾已经实现了从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到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的转变。通过“太阳花”运动，我们似乎可以判断，这个共同体将其绝大部分成员内化为台湾人的目标宣告完成。

族群转化为公民，“台独”理念转化为生活方式，建设公民社会自然成为本土政治势力的选择。从此，共同体的排异从生产方式转向生活方式，转向保卫小确幸与“生活台独”。“太阳花”运动通过排异获得了正当性，提供了价值的标杆，并通过“九合一”选举对台湾政治精英进行遴选和淘汰。

三、“九合一”：共同体自我更新与确立

致密共同体以自生长性和强烈排异性为特色，这既表现在价值观的塑造上，也表现在新制度的形成中。共同体作为具有自生长性的生命体，以制度承载价值、以价值形塑制度。在存在的共同体尚未达到想象的共同体状态时，自生长性与排异性发挥的作用特别显著。任何忽略了生命体本身自我表达、自我维持、自我发展本能的因素都可能被作为排异的对象加以排除。而任何排异结果，又可能促使政治力量屈从共同体的价值引导和制度规范，从而进一步加强共同体的独立性。

建构的社会共同体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自主体，与自然生命体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基因可以建构与重组。选举，作为建构基因、自我发动、自我认同、自我精英甄补与淘汰的机制，在台湾这个致密共同体的延续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多元竞选民主情势下的诱导与强制迫使候选人臣服共同体的排异性。

威权文化的特质与生命体的本能特制不合，威权时代的思想不好解决民主时代的事情。2008年，马英九作为超人气的政治明星，高票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并在2012年获得连任。作为一个长期接受精英教育、留学美国顶尖院校并在蒋经国身边锻炼的“没有缺陷的年轻人”，马英九具有威权时代的烙印和精英主义的特征。执政之初，马英九借高票之威兼任国民党主席，展开政治蓝图，他雄心勃勃，妄图做所谓“全民总统”，为台湾创立万世之基业。他针对岛内政治体制和国民党的弊端展开改革：22K、油电双涨、股市增税、军公教年金改革、推迟退休年龄并减少退休人员福利待遇、十二年“国教”改革，诸多改革措施眼花缭乱、触及民众利益、民怨上升；他试图将国民党从刚性政党改造成柔性选举工具、他试图彻底解决国民党派系问题，他试图彻底改造国民党的文化。他对党政的多重改革，几乎得罪了所有支持自己的选民，酝酿了反对的力量。他试图消除岛内已经存在的阶级掠夺、时代掠夺、地域掠夺，但是却创造了新的掠夺，创造了新的社会矛盾。他试图打清廉牌，然而他培养的后备人才却弊案连连；他试图解决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关系，却导致王马之争的无解僵局自取其辱威信扫地；他试图消灭党内派系，却使得派系冷眼旁观或带枪投靠敌营，消解了党内力量，引起党内强烈反弹；他决策的小圈圈引发了党内和岛内的公愤，使得反对力量汇集成河，终至溃堤。

无感的经济增长忽略了致密共同体成员的感受，必然成为排异的对象。马英九也算励精图治，在他任内尤其是第二任期，台湾经济均实现了正增长。2014年台湾经济走出低谷，岛内投资、消费与出口同时出现平稳增长，主要经济指标逐

步好转，呈现温和增长态势。第三季度台湾 GDP 增长 3.63%。^① 尽管 2014 年由于整体经济形势好转，薪资及就业均有一定改善，但由于增幅并不明显，台湾劳工阶层薪资长期停滞的总体情况尚没有根本性改变，加之低收入群体和青年就业形势依旧严峻，总体工资水平仍远低于亚洲其他“三小龙”，民众对民生改善的感受并不明显。^② 经济的增长没有使民众有感，民众的判断就是：权贵和大资本家拿走了这些增长和利益，经济增长只是加重了剥削，与他们无关！无感的经济增长导致民众不认同马英九自认为的执政成绩。而马英九对民意的漠视却导致他无法与民众顺畅沟通。不能顺畅沟通，便会积累民怨。民怨积累到质变，就会转变成选票，无论是教训还是报复，选票才是真正的民调，它检验着马英九的执政成绩单，并用选票说明无感的经济增长率并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

初选忽略共同体判断和自我发展本就容易成为排异对象。作为一个派系林立、矛盾重重的百年老店，国民党从来都是党内政治派别利益分配的工具，它从出生时就与各种派系同呼吸、共命运。2008 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竞选时的各种承诺并未由马英九转化为现实。之后，由于马英九强势兼任党主席并试图控制党内初选提名权，导致马英九与国民党其他各势力的矛盾冲突加剧。此次“九合一”选举的初选提名就是党内各种力量妥协的结果。从最终的选举结果看，此次提名的人选存在种种问题，有些县市如台北市、台中市就完全是因为候选人问题导致了国民党的溃败。国民党在南台湾只收获、不耕耘，最终导致南台湾彻底丧失，此皆有初选提名之罪。

共同体的安全意识最容易引发排异行为。台湾民众最引以为豪的食品安全出了问题，黑心油事件层出不穷，严重伤害了马英九当局的威信，降低了民众对行政团队的信任度。ETC 收费之类问题则加剧了民众对马英九当局无能的印象。而这些，无疑都成为本次台湾地方政治版图变迁的重要排异原因。

这场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种类最多、规模最大、纵深最广、结构最复杂的选举，以囊括整个台湾地区选民，贯穿从“直辖市”到村里的高烈度纵深，席卷了台湾社会。初试莺啼的“九合一”选举还将“直辖市”的山地台湾少数民族首长及民意代表的选举纳入体系，客观上继续在选举中形塑多元的台湾共同体，继续将民主与台湾主体性扭结前行，使得“生活台独”进一步制度化、价值化，台湾主体性进一步

^① 曹晓衡：《2014 年台湾经济发展的八大特点》，<http://www.chinanews.com/tw/2015/01-04/6933711.shtml>。

^② 同上。

生活化、青年化。制度规范价值，价值引领制度。制度的合法性、价值的正当性矛盾在地方选举中潜流而行，蕴含着对台湾政局的新影响。地方政治版图的变化以及政党对地方执政的治理则直接影响两岸地方互动乃至两岸层级的诸多变数。

“九合一”选举作为“太阳花”运动的遗续，把两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将共同体自我保护、自我更新确立与排异发挥得淋漓尽致。国民两党争相祭出“修宪”牌，未来的“国是会议”及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导向也都将跟共同体特性息息相关，台湾作为致密共同体的特性慢慢浮出水面。

结语

2014年，从“太阳花”运动到“九合一”选举，台湾社会经历了巨变。这个从春到冬的跨越有价值观的形塑、新民意的表达与认可，也有制度变迁带来的政治版图变化和政治势力角逐与重组。一言以蔽之，这是台湾共同体建构的延续，是既有法统正当性的进一步削弱与瓦解，也标志着台湾共同体的建构从族群民族主义走向了公民民族主义。共同体建构延续的过程中，族群转化为公民，“台独”理念转化为生活方式，制度和价值层面的共同体建构依然在内生中前行。共同体的建构作为政治过程，有延续性和发展性，它对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的影响值得长期、深入观察。

2014年台湾政党政治观察

陈星^①

2014年台湾政党生态进入激烈变动期，一方面是两个主要政党的内部结构均在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台湾政党力量对比的版图发生了剧烈变化，国民党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中输到近乎崩盘，在22席县市首长中只拿下了6席，而且多是偏远地区，而民进党的政治版图则出现大幅度增长。这种结果的出现事实上从此前一年的变化中已经显示出了蛛丝马迹，政治版图的变化其实是政治现实量变积累的结果。

一、国民党的变化

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党内长期累积起来的矛盾与结构性问题在选举的催化下加速爆发出来。整体上看国民党在党内权力结构的调整、政治诉求的调整、世代交替、动员模式等方面均出现了程度不一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形成了共时性爆发，最终导致了选举的大败。概括而言2014年国民党发展的变化主要有以下数端。

马英九与王金平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使国民党士气受到极大打击。在王金平党籍诉讼案中马英九没有占到便宜，王金平低空掠过，随后王金平利用“总长泄密案”狠狠还击了马英九。而在“太阳花学运”爆发之后，王金平则又暗中与马英九展开角力，不出席“院际协调会”，反而以一纸声明直指马英九应“倾听民意”，^②马王的斗争公开化并摆上了台面。3月底王金平率蓝绿“立委”到“立法院”探视

^① 陈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② （台湾）《中国时报》，2014年3月22日。